

□探索当代中国哲学的道路

## 跟从邹化政教授走近德国古典哲学

王南湜

[摘要] 德国古典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着不解之缘。邹化政教授上世纪 80 年代对于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辩证法的解读,对一大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形成了一条颇具特色的阐释路径。在教学中,邹化政教授的哲学思想和主张,对学生在初识德国古典哲学、走近黑格尔哲学、构建社会转型理论框架,并最终从黑格尔走近康德几个思想阶段上,产生了重要的引导、启发和鼓舞作用。

[关键词] 邹化政; 德国古典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 近康德阐释

[收稿日期] 2017-07-12

[DOI] 10.15939/j.jujss.2018.01.zx2

[作者简介] 王南湜,南开大学哲学院教授,哲学博士。(天津 300071)

我大学的专业是化工机械,1981年前基本上与哲学无缘。这年冬天在原来工作的化肥厂关闭后去机关工作又不适应,便转到了当地一所大学充任多少与原来专业有关的科学哲学教师,并在来年春天到吉林大学上助教进修班,这才算是第一次正式接受哲学启蒙教育。当时吉大哲学系最著名的学者有高清海、舒炜光和邹化政三位老师,大家都希望能多听听他们的讲授,学到些哲学真经。但高老师当时正忙于编写新教材,只给我们做过几次讲座,舒炜光老师则因患喉癌,难于发声,也只借助仪器才勉强讲过一次课,因而邹化政老师的课就成了我们能够得到的最佳选择。记得邹老师给我们助教进修班开过三四门课,此外,我还旁听了他给研究生开设的几门课。等到结业时翻检要带回家的课堂笔记,发现 20 多本中竟然有一大半是在邹老师的课上记的。这样,在吉大学习一年,经过老师们的哲学启蒙,特别是邹化政老师的耳提面命,我也就从一个纯粹的哲学门外汉开始窥到了一点门径,为后来步上哲学探索之途建立了一个自感还算比较纯正的出发点。

### 一、在邹化政教授的课堂上初识德国古典哲学

邹老师开设的课程主要是德国古典哲学,包括德国古典哲学发展史、哲学家专题和原著导读三类课程,后一类课程有黑格尔《逻辑学》研究、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研究等,此外也开设过洛克《人类理解论》研究等课程。但所有这些课程中所关注的中心内容最主要的还是黑格尔哲学。

从邹老师对黑格尔哲学的解读中,当时感受最深的是他对逻辑先在性和时间先在性的区分。这一区分今天对于从事哲学研究的人来说,似乎是颇为平常的东西,但在那个思想禁区刚刚被打

开的时期,对于初涉哲学的我而言,却有如醍醐灌顶,打开了一个以往不曾开启过的窗户,让我初次窥见了哲学思考所指向的那一超验境界。如果说我从工科转向哲学在起初多半还是为种种世俗因缘所牵引的话,那么,正是这一“窥见”,才让我真正迷上了哲学,将哲学思考当作了自己无可逃避的“天命”,并在其中感受了无穷的乐趣。

在邹老师的讲课中,逻辑先在性原理被运用于诸多问题和领域,但当时对我而言,这一原理的首要意义却是对于流行的哲学观念有了进行重新审视的可能,其中最重要的又是对于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之划分的重新审视。多年来,人们习惯于把哲学史归结为先进阶级与反动阶级之间斗争的理论反映,一股脑地把哲学上的唯物主义视为先进阶级的思想代表,而将唯心主义视为反动阶级的思想代表。这不仅极大地歪曲了哲学的历史,而且更重要的是导致了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严重误解,使人们无法真正理解马克思的哲学革命。而正是这一逻辑先在性原则,对于人们正确理解哲学的历史,特别是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有着莫大的积极意义。

按照人们当时对哲学基本问题的通常理解,区分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标准便是何者为本原,而这个本原又往往被理解为何者时间上在先,即时间先在性。照此看法,一方面,唯物主义便被理解为只是一种对于先有自然,后有人类及其意识的常识的肯认,而唯心主义则是一种罔顾这一常识的热昏的胡话。由于对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如此偏狭的理解,所导致的结果便是,一方面,人们无法理解人的能动性,从而无以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区别开来;另一方面,亦往往难以将客观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区别开来。一个显著的例证便是,一方面,人们通常用法国唯物主义去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另一方面,又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对于黑格尔唯心主义的颠倒,认为只要将黑格尔哲学中辩证运动的主体从绝对精神颠倒为物质便可成功地从黑格尔哲学转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然而,问题是,如此理解的作为辩证运动主体的物质,既然能够从中产生出生命、人类及意识,则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又有什么区别?这实际上只不过是把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置换成了“绝对物质”而已,除了名称的改变以外,实质并未有任何改变。这样,人们一方面宣称马克思在哲学上实现了一场革命性变革;另一方面,这一变革却被解释成一种如同儿戏般的简单转换,所谓“革命性”便也成了一种堂吉诃德大战风车式的滑稽之举。

面对这种理论上的尴尬,人们便不得不去另寻理解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出路。处在哲学观念大变革之潮中的我,尽管初涉哲学,却也奋力追随于其中。在这当中,邹老师所倡导的逻辑先在性原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为之提供了一种方法论指引。这是说,既然任何哲学基于某一原则对于世界的说明,都是一种逻辑先在性,而非时间先在性,那么,不仅用时间上的先后区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方式不能成立,而且仅凭逻辑上的先后也无以有效地区分这两类哲学倾向,而是必须追问其用以说明世界的这一原则本身的性质。既然马克思哲学变革的首要对象是黑格尔哲学,而黑格尔哲学用以说明世界的原则是绝对精神,且如果绝对物质与绝对精神并无实质性区别,那么,能够形成与之对立的说明原则的,便不是用一种绝对性取代另一种绝对性,而是要破除这种绝对性或无限性原则,走向一种有限性原则。具体说来,这便是走向有限的主体即现实的人及其活动。这种趋向便是众所周知的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的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阐释进路。也正是基于这一眼界,人们才发现了马克思哲学革命的起点正是对于黑格尔辩证运动主体之无限性的批判。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把人规定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而将其本质规定为“对象性的活动”,亦即有限的存在物。这意味着马克思要以之反对黑格尔“把人和自我意识等同起来”,将人理解为“非对象性的、唯灵论的存在物”,“知道自己是绝对自我意识的主体”。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哲学中,“主词和宾词之间的关系被绝对地相互颠倒了:这就是神秘的主体—客体,或笼罩在客体上的主体性,作为过程的

绝对主体，作为使自己外化并且从这种外化返回到自身的、但同时又使外化回到自身的主体，以及作为这一过程的主体；这就是在自身内部的纯粹的、不停息的旋转”<sup>[1]176</sup>。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更是强调从“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现实的个人”出发。<sup>[2]71-72</sup>显然，“现实的个人”只能是有限的存在物，有限的主体，而决非无限的或绝对的主体。因此，所谓对于黑格尔哲学的颠倒，便只能是用有限的“现实的个人”取代绝对精神而作为辩证运动的主体，所做的颠倒便决非绝对精神与绝对物质之间的易位，而是人作为有限者与绝对者之间关系的颠倒，是人神关系的颠倒！

当然，邹老师本人并未从其逻辑先在性原则中引申出对于马克思哲学的实践唯物主义阐释，而且，不少主张实践唯物主义的人们也未必关注过逻辑先在性原则。但无论如何，对我来说，正是从对逻辑先在性与时间先在性的区分开始，走上了对于马克思哲学的实践唯物主义理解，而且，从逻辑上讲，逻辑先在性原则也可以说构成了通向实践唯物主义的前提性条件，或者说，是对于实践唯物主义的一个奠基。

## 二、沿着邹化政教授指引的路走近黑格尔哲学

1983年初，助教进修班结业之后，我告别了吉大，背着20多本课堂笔记回到了原单位新疆喀什师范学院（现为喀什大学）。临行前特意到家中去拜别了邹老师，希望能从他那里再得到些教诲。虽然在课堂上的邹老师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但回到生活中，却沉默寡言。当时坐了不短时间，邹老师也无多言语，记得的只是他关于做学问的几句话，其中印象特别深刻的一句话是，在理论上一定要彻底，不放过任何一个有疑问之处。

回喀什后，本欲就在此教书和读书，但又一次机缘凑巧，有了一个机会到中央党校理论部去读研究生。当时蒋南翔任主持工作的第一副校长，高教部长出身的他，教育理念是要把中央党校纳入普通国民教育体系。此举得失成败，非我辈所能评价，但从我们这批研究生切身处看，却从中得到了切切实实的“好处”，那就是有幸聆听了张岱年、任继愈、汪子嵩、黄楠森、齐良骥、张世英、王太庆等一批一流学者的授课。这些课程当中，德国古典哲学仍是学习的重点，当然也是难点。虽然老师们讲授得很是精心，但大家理解起来仍有不少疑难。好在有邹老师的先期引导，特别是借助那十多本课堂笔记，通过近两年的学习，算是在对德国古典哲学的理解上又有了不小收获。受邹老师的影响，大概也和寻求终极知识的情怀有关，黑格尔是我此时最为关注的哲学家。记得邹老师在课堂上曾讲过，他崇拜斯宾诺莎。但同学们都明白，他心里所指的是黑格尔，只是由于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而斯宾诺莎则被判定为唯物主义者，他才这么说的。在邹老师的先期熏陶下，我这时虽然还不能说就是黑格尔的信徒，但在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上却已经十分黑格尔主义化了。我所选定的硕士论文的题目《〈资本论〉中的辩证法问题》，便是试图以黑格尔的方式重构《资本论》中的辩证法体系。

照我当时的理解，黑格尔哲学是对于绝对精神历史发展的描述，而马克思对于黑格尔哲学的改造，便是将辩证运动的主体从绝对精神转换为了现实的人，因而，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便是对于现实的人的历史发展的描述。而所谓辩证法，就是用于描述的方法或逻辑。这种描述之所以需要辩证法，是因为它所描述的对象乃是一个有机整体性的存在，而辩证法正是用来把握有机整体的方法；若对象并非有机整体，便无须辩证法。如此看来，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由于其为一种非对象性的绝对之物、无限之物，因而其所构成的整体便是绝对的、无限的整体存在，而马克思视

作为运动主体的现实的人，既然是对象性的存在物，受对象限定的因而是有限的存在物，其所构成的整体便只是一种有限的或相对的有机整体性存在。因此，一方面，由于两种哲学的对象都为有机整体，因而便都需要以辩证法加以描述，这就是说，马克思在某种意义上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但另一方面，又由于基于“绝对的”或“无对的”绝对精神之主体，与“有对的”对象性存在物即人主体的根本性区别，马克思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法又有着根本性的区别，即黑格尔辩证法是一种自我封闭的绝对真理体系，而马克思的辩证法则为一种开放的有限真理的体系。

据此理解，我在硕士论文中所确定的理论目标，是把《资本论》中的三个辩证法基本原则——从抽象到具体、矛盾进展、逻辑与历史的一致——把握为一个具有内在统一性的有机整体。论文首先论述了有机整体必然内含矛盾这一前提。有机整体是诸要素相互作用的统一体，诸要素相互作用、相互联系而形成的有机整体具有超出诸要素自身规定简单相加的特性。这超出的特性作为整体的总体规定而贯通诸组成要素构成了有机整体中的普遍性层次，为普遍性所统摄的诸要素则为其中的特殊性层次。普遍性既不能脱离特殊性而又超出特殊性，特殊性不能归结为普遍性而制约着普遍性，从而两者就构成了有机整体内部的矛盾关系。事物的发展便是这两个层次之间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的过程。这表现在反映它的理论中，便是普遍性经由特殊化而达于个别性的过程。《资本论》中从抽象到具体的上升过程，就是这样一个由最初的抽象普遍性经过与对立面的相互作用而特殊化，从而达到具体普遍性即个别性的过程。同时，这一过程也是一个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过程。这是因为，所谓事物的逻辑，亦即现实生活的内在结构，而这一现实的内在结构是由历史发展而来，历史过程以扬弃的形式保存在现实之中，历史过程的总和与现实是同构的。因此，《资本论》中辩证方法三原则的内在统一性的基础在于矛盾进展原则：矛盾进展规定着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矛盾进展又是逻辑与历史相一致原则的内在依据，因此，矛盾进展原则是马克思辩证方法的实质。

显而易见，在硕士论文中这样一种对于马克思哲学的解读，尽管十分强调马克思的现实的人作为主体与黑格尔绝对精神主体之间的根本性差异，但就基本精神而言，却无疑是极为黑格尔主义化的。这是因为，这种解读所依据的原则主要是马克思早期著作，特别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观念，而在很大程度上淡化了马克思后期对于资本主义的科学研究，在某种意义上也将《资本论》作了人本主义的解读，从而发展出了一种超越于科学的准思辨体系。这种黑格尔化的解读，是那个时期的一种新潮，我只是随着这一潮流行进而已。当然，这一解读方式对于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从那种僵化的机械唯物主义阐释体系中解放出来，是有着巨大的积极意义的。正缘于此，它才成了自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的主导性阐释模式。

### 三、在邹化政教授辩证法观念启发下构建社会转型理论框架

邹老师讲辩证法并不是只就康德、黑格尔的经典原著做出阐释，而是经常加以发挥，将人们惯常理解的哲学命题用辩证法加以新释。这些新释看似信手拈来，但却常常令人耳目一新。有一个例释特别令人印象深刻，那就是对货币与普通商品关系的独特理解。我们知道，黑格尔辩证法的矛盾进展是一种从抽象普遍性到特殊性，再到个体性或具体普遍性的“三步舞”。邹老师在讲到这一关系时以《资本论》中关于货币与普通商品的关系为例：价值是一种抽象的普遍性，普通商品无疑是诸多特殊性，而货币作为一种体现于某些特殊商品上的普遍性，则正是一种具体的普遍性或个体性。讲到这里，邹老师似乎意犹未尽，还进一步发挥道：还可以把货币理解为普通

商品的“上层建筑”，亦即这一关系类似于“经济基础”与“政治上层建筑”的关系。在这里，邹老师独特之处是不像人们通常所做的那样，把上层建筑理解为在经济基础之上的外在建构，而是理解为由从经济基础自身超拔出来，但又是经济基础自身的本质规定，是经济基础之本质结构在有形物上的集中体现。在我的记忆中，这一理解当时令我兴奋不已的是，它同时也就意味着可以将“政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反向地理解为类似于货币与普通商品的关系。当然，当时只是由于看见了一个全新的视域的兴奋，却没有想到在时隔十几年后，当我研究社会转型遇到如何建构理论框架的问题时，邹老师这一信手拈来的例子，竟成了我建构社会哲学的一个基础性的方法论原则。

在上世纪90年代，时值中国社会大步迈向市场经济之际，在短短的十多年间，人们的社会生活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何描述和理解这种变化，已成了理论界关注的一个中心课题，哲学研究自然也不会置身事外。描述这种变化便是描述社会转型。说到社会转型，自然是指从非市场经济社会向市场经济社会的转型。当时，人们从不同学科对这一转型做了多方面的描述，但这些描述却无疑大多只是现象层面的东西。哲学固然也可以通过归纳这些现象性特征，对社会转型做某种更为系统性的描述，但系统性的现象性描述，仍是现象性的，而把握住这一转型的最为本质的东西，才应该是哲学的任务。那么，应该如何进行呢？我试图从社会理论大师们的社会类型理论中寻找方法。我们知道，马克思把非市场经济社会 and 市场经济社会规定为“人的依赖关系”和“物的依赖关系”两大类型，梅因关于“身份社会”与“契约社会”的区别，滕尼斯的“共同体”与“利益社会”的概念，迪尔凯姆对“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的分类，韦伯的“价值合理”与“目标合理”的社会行动类型划分，也都是从不同角度对于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或者说，对于非市场经济社会与市场经济社会的基本特征的刻画。这些分类无疑都从不同方面揭示出了这一社会转型的本质性规定，但如何将它们纳入一个更具整体性的规定中去，使之成为描述社会转型的基本框架呢？马克思、梅因、滕尼斯、迪尔凯姆、韦伯等人的分类，实际上都关涉到社会团结或社会秩序的形成方式，或者说，生产方式，那么，社会转型是否可以从社会秩序的形成或生产方式的变迁来加以描述呢？

这里的关键是找到社会转型或变迁中“变”中“不变”的东西作为描述的参照系，不然的话，便无法达到真正本质性的层面。在对描述社会转型理论框架的探寻陷入困惑之时，邹老师关于货币与普通商品的关系可视为同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关系的观念，突然从脑海深处蹦出来，使我一下子获得了一种“灵感”：能否用马克思关于货币与普通商品关系的理论来理解社会秩序的形成呢？若行得通的话，便不难找到非市场经济与市场经济两种社会类型在形成社会秩序方面共同的东西与不同的东西。找了共同的东西与不同的东西，并加以描述，不就是对于社会转型之本质的把握吗？

我那时的想法是，社会秩序无非就是以某种规范去约束人们的行为，那么，这用以约束人们行为的规范在其有效地发生作用的范围内便是一种普遍的东西，是保持这一范围内人们有序存在的一种同一性。这一定范围便是一定数量的人群，当有某种作为普遍的东西或同一性的规范使一定的人群统一在一种秩序之下时，该人群便成为了一个社会组织。这样，在一个社会组织或集团之中，便至少存在着两个层面，一个是作为社会组织之构成者或成分的每个人，另一层面则是该组织整体自身。个人本身自然直接就是其体现者，而作为整体的组织则在直观上是无形的，或者说，规范作为整体之根据、之代表，只是一种抽象的存在，它必须体现于各个个体的身上才成为现实的。但抽象的东西不会自己实现自己，要使之实现，必须通过一定有形的力量、有形的物或人。这是说，或者必须是每一个体自觉地将规范落实于自己的行动中，或者通过一种强制力量

代表社会整体即普遍的东西来强使人们按规范行动,当然,更可以通过半自觉半强制的方式将规范落实于行动中,以保证社会的有序存在。在自觉的方式中,社会的同一性、普遍性是内在于每个个体之内的;而在强制的方式中,社会的同一性、普遍性则对象化、个体化在特定的个人或特定的物身上的,使这些个人或物成为社会的化身,即普遍的东西采取了特殊的存在方式,或者说,特定的个人或物被提升为了普遍的存在物。这种情况便正是商品经济中作为货币的金银之类与众多商品的关系。金银本身只是一种特殊的商品,但当它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之后,却成了一种普遍的商品、一种“通货”。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在货币上,一般财富不但是形式,而且同时就是内容本身,可以说,财富的概念实现在一种特殊对象上了,即个体化了”,“因此,货币是商品中的上帝”。<sup>[3]170-171</sup>一般的社会秩序对象化于特定个人身上,便是官员。因而,我们也可以说,官员作为社会规范之对象化,正是一种社会中的“通货”,芸芸众生中的“上帝”。

这样一来,我们便似乎可以将社会秩序形成,视为一种以将一个社会群体中普遍性原则对象化于某种具体事物,并由其统领其成员的方式。这样的生产方式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主要通过官员所体现的政治权力系统来形成的,另一类则是在很大程度上通过货币所体现的经济权力系统来实现的,政治权力系统在其中则起着辅助作用。但无论是哪种生产方式,其机制都是可以用货币与商品的辩证关系去理解的。

据此,我们便可以用马克思所说的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的观念,反过来从货币与商品的辩证关系来理解传统社会的官僚政治系统。官员既然是社会规范之化身,那么,他便拥有以社会的名义来使个人服从社会规范的力量,这种可以支配他人的力量便是权力或权威。当人们对于规范的服从是出于对官员代表社会的合法性的认可时,官员所具有的力量便是一种权威,而当这种服从只是出于对于官员所拥有的强制力量的畏惧时,官员便只有权力而无权威。一般说来,官员作为一种双重性存在,一方面他是社会整体之代表,这要求他的一切行为只符合普遍规范,而不允许夹杂特殊的私人性东西;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特定的、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的活生生的个人,有自己特定的利益、特定的欲望、特定的行为方式。因此,在官员身上,普遍性之规范与特殊性之私人利益等的矛盾特别突出。这要求一个人若想成为一个合格的官员便必须具有为了社会整体而抑制自身特殊性的高尚品质,品质的高下决定了一个人能否成为合格的官员。正如虽然任何一种商品都能够充当货币但并非任何一种商品都是货币的适当承担者一样,也并非每一个人都是官员的适当承担者。金银是货币的适当承担者,而木材、土地等则不是。当然,正像人们可以用黄铁矿冒充金子,或者往其中掺杂其他物质一样,人们也可以伪装高尚,也可以假公济私。当官员堕落成假冒伪劣者之时,权威就蜕变成了一种纯粹的强权。一般说来,正如纯粹的金银不存在,完全假冒的金银很难正常流通一样,纯粹的权威很少存在,完全凭强权的统治也很难长久,而经常的情形则是权威与强权的混合。所不同者,只是在混合物比例上的不同,在这种情况下,官员一般便是一种“不纯的金银”,他在执行普遍性规范的同时,也为自己以及自己所属的那个小团体谋取私利。如果谋私利不太过分,社会上往往也能接受,并视之为常态。官员的这种双重身份,使得官员这种社会职务成为竞相争夺的对象。当然,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则是如何实现普遍性规范。

而市场经济社会中,由于商品交换必须以一定的市场秩序存在为条件,因而在这里,货币作为“商品中的上帝”,便取代传统社会中的官员在形成社会秩序中起到了相当程度的作用,从而使得社会秩序的形成不同于传统社会主要依赖于政治权力,而是有了经济与政治两个层面的联合生产方式。这使得市场经济社会不同于传统社会的诸领域合一之结合方式,而是趋于诸领域分离。

值得一提的是，前不久得知，在邹老师上世纪80年代初将货币与商品的关系理解为类同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关系的前后，德国的“新马克思阅读”在对《资本论》价值形式辩证法解读的基础上，提出了“国家衍生”说，即认为价值形式、资本逻辑对于资产阶级国家形式有决定性作用，将国家看成只是资本逻辑的“衍生”。这一“国家衍生”说虽然有着极为不同的理论背景，但就将政治国家与价值形式看做同构的方式而言，与邹老师的理解却不谋而合。无疑，他们之间是互相不知道对方的观念的。这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 四、在邹化政教授理论精神的鼓舞下从黑格尔走近康德

像许多同时代人一样，在上世纪80年代投身哲学，除了种种机缘之外，自身处于社会生活大变动时期，心中难免存有种种疑惑而试图从哲学这一终极理论中求得解答。初次接触黑格尔哲学，之所以为之折服，正是由于它的体系宏大、无所不包，似乎能够解答任何问题。然而一旦走近这种思辨哲学体系，虽然看似能够解释一切疑惑，但其所提供的解释却又如同在云雾缭绕的高空中远眺大地，总是令人感到模糊不清，难以满足理论精神的需要。因此，在我内心中总是感到一种涌动，一种寻求更为彻底和清晰地解答疑惑的涌动。而彻底性和清晰性正是从邹老师那里所感受到的理论精神。记得在课上和课下的答问中，邹老师总是不回避问题，要对每一个问题都给出清晰的答案。对于一时不能解答的问题，他也从不含糊其辞，而是反复力求找出合理的解释。对于权威性的命题，如果有不清晰或不合理之处，也照样予以追问和更正。正是在邹老师这种理论精神的鼓舞下，我开始怀疑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黑格尔主义解读的合理性，而试图寻找更好的阐释方式。

这种寻找突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起初，虽然不满于黑格尔主义阐释方式的空泛和漫不切题，但却一时找不到新的阐释之道。在这一时期，关于中国社会转型，道德哲学、政治哲学等有关社会生活方面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一时间，这方面的研究成了显学。在这一大潮之中，作为主导性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不会袖手旁观，而是要引领潮流。然而，一旦进入实际研究，尽管议论不少，但在研究中人们却不难发现，作为一种规范性理论的道德哲学、政治哲学却不仅无法从教科书体系的机械决定论引申出来，同样亦无法从黑格尔主义阐释方式中引申出来。这便意味着，那些热闹的议论是缺乏根基的。因此，要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道德哲学研究奠定一个基础，就必须对既往的阐释做出新的阐释，使之能够兼容规范性原则。

由于多年来以卢卡奇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性阐释中所起的积极作用，人们自然会在其中寻求理论支援。更重要的是，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既然被视为是对于第二国际机械决定论的批判和对于人的能动性的论证，那么，人们自然也希望能够从中找到所需要的东西。该书以对无产阶级意识的证成为主题，亦向人们宣示了这一点。但通过对卢卡奇著作的反复研究，得到的却是令人失望的结果。多年来，我一直给研究生讲授《历史与阶级意识》。由于该著作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有着极为类似的逻辑结构，因而我便把这两部著作关联起来，从《精神现象学》的如何证成实体即是主体的结构，去理解无产阶级如何从历史的客体达于对于其历史地位的自我意识，即达于历史主体的过程。但在阐释中逐渐意识到，在论证无产阶级如何达于自由自觉的可能性时，卢卡奇并未摆脱黑格尔式的历史决定论，即在卢卡奇的论证中，无产阶级之达到自我意识，并非无产阶级之内在的自发行为，而是受控制于总体的历史性，只有在总体历史进展的某一个阶段上，由于被置于性命攸关之处境，无产阶级才被“推到了”自我意识之中。尽管这被解释为一种客观的可能性，从而似乎为主体的能动性留

下了余地,但这种可能性归根结底仍是被决定的。这样,无产阶级之自觉性,从根本上说来,就仍然是一种历史必然性,而并非取决于其自发性。而且,这一所谓“客观的可能性”的论证方式,即便假定其合乎逻辑地证成了无产阶级意识,所说的也仍是一种不同于每个工人个体的总体性的“阶级意识”,于是也就留下了一个如何从这种总体性的阶级意识达到个体意识的问题。这也就是颇似于卢梭的“公意”与“众意”之间关系问题的“被赋予的阶级意识”与“经验的阶级意识”之间的关系问题。在卢梭那里,为了克服“公意”与“众意”之间的张力,他甚至要强制实行“自由”,使得那些停留于“众意”的众人“被自由”。而在卢卡奇这里,亦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工人阶级的意识(物化和自由)范畴便形成对立的两极,它们分属两个不同的社会团体:无产阶级依然停留于物化之中,并且凭靠自身是无法实现其客观可能性的;而这个政党的领导者不言而喻地被认为是辩证认识的承担者,因而是自由的”<sup>[4]375</sup>。为了达到现实的自由,这一张力必须被克服。但如果这一张力是卢梭式地被克服的,即无产阶级是“被自由”的,那么,所实现的这种主客对立的扬弃即人类的自由解放就是十分可疑的。

但卢卡奇的这部著作毕竟对于马克思哲学作黑格尔主义阐释的典范之作,其在证成无产阶级意识上的失败,并非只有消极的意义,而是以其失败从根本上宣示了黑格尔主义阐释路径的不通。这也就同时意味着人们必须另觅他途。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个“他途”也是《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所显示出来的,那就是出离黑格尔哲学而走近与之不同的康德哲学。我们知道,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是将康德哲学视为资产阶级意识的典型表征,而沿着黑格尔批判改造康德哲学,消除其二元论的进路去证成无产阶级意识的。这意味着,康德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之间具有一种正相反对的关系。进而,这还意味着,如果说卢卡奇式的对于马克思哲学的黑格尔主义阐释是一种不成功的或者说偏离了马克思哲学之正道的解释的话,那么,康德哲学在某种意义上便是一付矫正剂或解毒剂。认识到这一点,便引导我进而对马克思哲学做了一种“近康德”式的阐释。当然,只是“近康德”,而非一种康德主义式的阐释。目前,这一阐释还在探索之中,但可以指出的是,这种阐释至少能够为说明人的能动性留下空间,从而也就能够为建构一种马克思主义规范理论,进而为道德哲学、政治哲学建立一个基础。

在对马克思哲学的阐释上从黑格尔主义走向“近康德”,就理论趋向而言,初看起来似乎是离邹老师愈来愈远了,但我从内心能感受到,邹老师是会首肯我的这一转变的,因为在理论精神上,我感到是离邹老师更近了。

####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
- [2]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 [3]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
- [4] 吉多·斯塔罗斯塔 《科学认识和政治行动——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思想悖论》,衣俊卿、周凡主编 《新马克思主义评论》第1辑《超越物化的狂欢》(卢卡奇专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

[责任编辑:白刚]

**Can the Term Spread Predict Business Cycles Phase Transitions in China:  
A Positive Study Based on MS-TVTP Model**

WANG Jin-ming ( 85)

**Abstract:** Before macroeconomic fluctuation , the leading indicators will give early warning signal which precautions the macroeconomic direction. Based on Markov-switching model with time-varying transition probabilities ( MS-TVTP) , this paper measures if term spread has the early warning effect on China's business cycles phase transitions. We firstly calculate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between various of term spread and SW index which reflects macroeconomic fluctuation , finding that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for the spread between the 15-year and 2-year bond spot rate and the SW index are the highest one. Introducing it into MS-TVTP model , the outcome shows that the corresponding transition probability will change according to fluctuation of term spread , which indicates that our economy switches from one phase to the other. Based on our model , we argue that the contraction probability will increase gradually in the recent days.

**Keywords:** term spread; business cycle; phase transition; MS-TVTP model

**Pricing ESOs under Financial Performance Restriction and Its Incentives**

ZHOU Bai-cheng , MA Ke-wei , FENG Hao-lun ( 94)

**Abstract:** Our article brings the performance influence to the option pricing process. By substituting perpetual ESO for finite maturity ESO , we obtain a new analytical ESO valuation framework that captures the holder's risk aversion , American style , hedging constraints , employment shocks , vesting period and performance influence. From each side of the ESO contract , we obtain expressions of the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value of six different executive stock options: traditional options , purchased options , premium options , capped options , indexed options and performance-based options. At last , we examine parameters sensibility and the characteristic incentive effects of different ESOs.

**Keywords:** executive stock options; option pricing; financial performance-vested; incentive effects

**Mr. Zou Hua-zheng , Being a Real Man and Being a Scholar**

ZOU Guang-ven ( 105)

**Abstract:** In this paper , I honor the memory of Mr. Zou Hua-zheng , a famous philosopher in China , from two aspects: being a real man and being a scholar. As a real man , Mr. Zou was a man who lived in his own spiritual world , a man of sincere kind and open-minded , and a man of dedicating his life for truth. As an erudite scholar , Mr. Zou was a learned man with grand view , who held a unique perspective on both western philosophy and Chinese philosophy. The greatest achievements in his distinctive philosophical thinking are as follows: defending the faith of philosophy as humanism , logic priority in philosophy , and interpreting the Chinese philosophy with law of man as law of the whole.

**Keywords:** Zou Hua-zheng; being a scholar; being a real man; philosophy as humanism; logic priority; law of man as law of the whole

**Coming Near to Classical German Philosophy Following Prof. Zou Hua-zheng**

WANG Nan-shi ( 115)

**Abstract:** Classical German philosophy has an indissoluble bond with Marxist philosophy. In the 1980s , Prof. Zou Hua-zheng's interpretation of classical German philosophy , especially of Hegelian dialectics , profoundly influenced a large number of Marxist philosophical researchers and formed a distinctive path of interpretation. In this essay , according to the author's own experiences in preliminarily understanding classical German philosophy , constructing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 and coming near to Kant form Hegel , the author will show how he is guided and inspired by Prof. Zou's spirit and theoretical notions all the time.

**Keywords:** Zou Hua-zheng; classical German philosophy; Marxist philosophy; near-Kantian interpretation

**Return to Nature and Natural Law:**

**In Memory of Professor Zou Hua-zheng**

WANG Tian-cheng ( 123)

**Abstract:** Professor Zou Hua-zheng was exploring truth in philosophy all through his life. But in different stages, the subjects he explored were different. In his final work *Scientific System of the First Principles of Philosophy*, he expressed mainly his final logical reflection on philosophy. Professor Zou called the science of first principles of philosophy “natural philosophy” in broad sense, which includes ontology, epistemology and axiology. Here, Professor Zou reached an understanding to natural life and it shows that Professor Zou had gone beyond himself to return to nature.

**Keywords:** Zou Hua-zheng; nature; natural law; ontology

**On Paradigmatic Shift in Recent World History Studies**

HE Ping, LI Ming-yu ( 130)

**Abstract:** During the last several decades, a paradigmatic shift occurred in the writing of world history. The new paradigm is characterized by a keen awareness of the global as whole, an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and the use of the concepts and methods of disciplinary like anthropology, sociology, economics,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ecology, etc., in the intellectual inquiry of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in a much more sophisticated manner. The focus of the new paradigm is on the cross-cultural interaction,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events of wide impact and the integration of the world. The new paradigm contains three sub-fields, global history, trans-national history and cross-cultural research. The research objective of the global history is a common pattern across all cultures, the integration of the world and the diversity of the human experiences. Transnational history studies cross-boundary networks and interaction. Cross-cultural research explores the interflow of ideas, knowledge and cultural forms occurred before the form of modern states. Accompanying the paradigmatic shift is the re-framing of world history as an object of a discipline and the change of the scale of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The paradigmatic shift does not mean that all a big narratives. It only urges that even doing a micro study, one should also illuminate his topic by a wide perspective and theoretic vision.

**Keywords:** new paradigm of world history; global history; transnational history; intercultural studies

**The Yasukuni Shrine, Hero Sacrifices, National Story:**

**The Generation and Solidification of Modern Japanese War Memories**

ZHENG Yi ( 144)

**Abstract:** The Yasukuni Shrine is the sacrificial places of the war created by the Meiji government in order to establish its own legitimacy status since the Meiji Restoration, which position above the general shrine and its ideological basis is the Japanese folk imperial hero sacrifices. With Japan's victory in the Sino-Japanese War and Russo-Japanese War, the religious colors of the Yasukuni Shrine were gradually transformed from the place of defend soul in the civil war ( defend and comfort soul) into the place of hardening the memory of the war in the aggressive war ( highlight the spirit). This function of the Yasukuni Shrine was further built into “national device” to solidify Japan's social war memory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Yasukuni Shrine became “temple” to concentrate Japan's history memories of the foreign war, which played an irreplaceable role of spirit encouragement and the “spiritual” collection in Japan's foreign aggression war mobilization.

**Keywords:** the Yasukuni Shrine; war memories; Japan's national Shinto;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aggressive war